

← (上接5版)

共活动，文风华丽且党派特征愈加凸显，这让年轻的拉希颇为不快。

最糟糕的结局每每发生在最好的时候。1956年，拉希与奈儿·康马杰在恋爱两年后订婚，拉希正式成为康马杰的女婿，并且得到来自威廉姆斯学院两年的讲师聘书，一切看起来都十分圆满。然而秋季学期开始后，康马杰出乎意料地向历史系告知，因为不满哥大正教授的低薪待遇，他决定辞去教席职务转投阿默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后者开出的价码是哥大的两倍之多，且没有硬性的教学任务。按康马杰传记的作者，纽约知识分子研究专家尼尔·朱蒙维尔(Neil Jumonville)的说法，康马杰平日乖张跋扈的学阀做派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同事，他的离去让人既拍手称快，同时也让有些人嫉妒不已。圣诞节前夕，被公认为学术希望之星的拉希在博士生资格面试中，被无情地拒之门外，消息传来令所有人震惊。拉希对知识分子的幻灭，恰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让拉希与康马杰心生间隙的最大原因，还是两人对于学术观念的根本分歧。康马杰始终以杰弗逊理念的继承者自居，对帕灵顿式的美国思想进步史有着偏执般的喜爱，不容他人与其争辩，即使在家庭聚会中也是禁言学术，漫谈时政与奇闻异事为主。拉希对此自然不能忍受。外界或许难以想象，这对学术翁婿在平日中基本无甚交往，对彼此的学术观点和著作更是不提及，两人间的“冷漠”关系可见一斑。

从拉希的角度审视，康马杰当属那批奉进步观念为金科玉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进步的痴迷和无质疑的信仰，恰恰造成了对于过去的怀旧式纪念。“进步与怀旧是一体两面的共谋产物，唤起怀旧的真正目的乃是将它活埋”。这段评语未免过于刻薄，但是对进步的无条件痴迷恰恰也是塑造自恋式人格的心态基础。拉希曾引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看法：十九世纪以来人们拥抱绝对的进步理念所带来的危险，要大过宗教狂热、迷信和偏狭带来的后果；这会带来一种“精神干燥症”(spiritual desiccation)般的症状。当进步的幻象被无情的现实击溃后，很难想象除了“无以言表的焦虑”与“漫无目的”的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词语形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状态了。

亦师亦友的霍夫施塔特

学术界乃至拉希本人都承认，真正驱使他重塑美国平民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在于从源头上纠正由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塑造的美国东西部平民党人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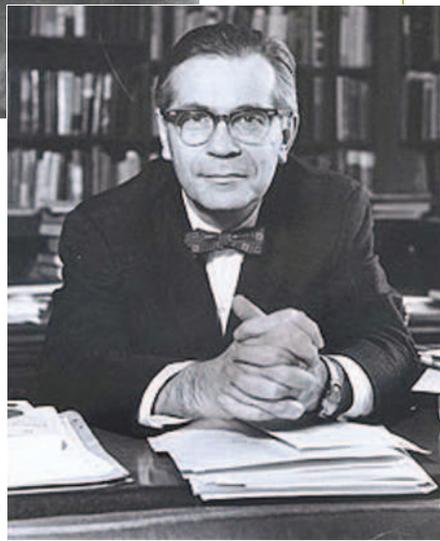
霍夫施塔特之于拉希，称得上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拉希从哈佛转投哥大学习时，恰逢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深度交融期，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为代表的研究路径对传统的人文历史研究形成了全面冲击，哥大则是这轮学术范式更替的最前沿。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霍夫施塔特敏锐地捕捉到这轮学术热潮对于撰写美国进步改革历史的特殊意义：通过对社会阶层心态变化的捕捉与深描，寻觅改革动因的根本动力所在，从而改变传统的以精英为主体的政治史书写范式。霍夫施塔特的《改革的年代：从布莱恩到罗斯福》一书，成为这种学科范式转型的代表性著作。《改革年代》不仅史论张弛有度，论点鲜明深刻，文笔亦典雅优美，至今依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改革年代》激起的最大学术涟漪，是霍夫施塔特笔下保守、排外、种族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形象，他们不仅仇视崛起中的城市，也对城市阶层的兴起和进步改革运动持强烈抵制态度，因此他们是落后、愚蒙和反动的，他们对过往乡愁般的怀念并不能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受侵蚀，在进步面前他们的反抗亦是徒劳的。这种近乎诗性的历史描述激起了历史学者的普遍异议，认为作者夸大、和用文学想象替代了历史的真实发展。经过六十余年的史学发展，霍夫施塔特的观点已经被学术界主流所抛弃。2008年美国历史学家查理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的《平民主义者的远见》(The Populist Vision)从整体上颠覆了霍夫施塔特的历史叙事，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褒奖。但《改革年代》塑造的诸多历史人物，却长久地留在公众的印象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在拉希眼中，霍夫施塔特对待平民主义的消极、乃至厌恶态度，浸透着那代知识分子经历三十年代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体验从参与激进运动、梦想破灭进而全身而退，在战后全力阻击麦卡锡主义、捍卫



阿瑟·施莱辛格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威廉·里希滕伯格

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拉希极为钦佩霍夫施塔特这代学者试图从整体上书写美国历史的智慧和才情，但是对他们为了某种强调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同质性而刻意地塑造对立者的观念大不以为然。在拉希看来，要批评乃至挑战霍夫施塔特与《改革年代》形塑的平民主义者形象，首要的还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要从它所褒扬的那些美国进步知识分子角色入手，分析他们的心理预期与行为目的，看看是否真的能够言行一致。

拉希与霍夫施塔特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过多次，后者也非常明白学生试图挑战他观点的立场。但霍夫施塔特欣赏拉希的智识才华，更为欣赏他的质疑态度，并毫不怀疑他能够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拉希在系里遭遇挫折后，霍夫施塔特亦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拉希。拉希离开哥伦比亚后，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在后者出版有关美国激进知识分子著作的过程中，霍夫施塔

特为其寻找优秀的出版商，通信讨论书稿事宜，疏导他要平衡学术书籍与畅销著作之间的微妙关联，并为其撰写热情的推荐语，称赞其必将成为“当代美国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批评家”。这些点点滴滴，拉希都铭记在心，在内心最深处，拉希早已把霍夫施塔特看作真正的思想领路人。

霍夫施塔特罹患血癌猝然去世，令拉希倍感伤心。1970年拉希在经过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洗礼后，来到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经历倍感失望的左派运动后，拉希提笔写信告知霍夫施塔特此刻的复杂感受，并告知自己最新的学术兴趣，希望聆听他的意见。但令他错愕的是，拉希的信投送到哥大历史系办公室的当天，就传来了霍夫施塔特逝世的消息。这让拉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和自责之中。之后霍夫施塔特遗孀邀请拉希为其著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撰写序言，拉希得以借此机会论述导师在书写政治思想史之际，搭起与进步主义史学(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拉希看来，霍夫施塔特对比尔德、帕灵顿、特纳等强调利益集团与阶级斗争的进步主义史学的重新审视、反思与扬弃，代表他已经开始认真重新思索“进步主义”这个概念所带来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影响。崇尚进步的指针在六十年代已经遭遇现实的巨大反讽，而如果拉希这代知识分子依然机械式地把过去视作“有用的工具”，刻意追求他们自己的进步与思想乌托邦，那么他们离真实的历史图景不是更近，而是愈加遥远。拉希以此文来铭记霍夫施塔特这代人的智识贡献，劝勉年轻一代史学家能够继承他们的衣钵，破除对某些固有价值观念的束缚，在自我批判之中寻求历史写作的真谛。

* * *

克里斯托弗·拉希对美国平民主义寄予厚望，是他对于美国自由文化诸多弊病的深深失望而兴起的。拉希对平民主义的推崇，也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崇尚理性进步，追捧现代性的一种基于历史现象的思想讨论。客观地说，这个维度的讨论，是我们当下观察西方所谓民粹主义思潮时所或缺的环节，有必要补上。

进一步而言，拉希这个“中心的边缘人”形象的再度丰满，也让我们深究20世纪美国思想文化的多重面向和内在张力，多了一个可资探讨的人物角色。他与美国思想史上众多人物的情谊与纠葛，反映了作为日常生活经验折射的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拉希注定是格格不入的。他曾被询问为何偏爱使用“希望”(Hope)，弃用“乐观”(Optimism)，他如此回应：因为希望代表着有深度信仰的追求，对有普遍意义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简单的进步执念是不会把你带往真正的希望期许之地的。拉希这种带有深厚情愫与温度的思想意义探寻之旅，恰恰是今日西方众多精英与知识分子所缺失、缺位乃至丧失的。在当下这个难以命名的时代，重读拉希的篇章文字，重拾他的希望之语，作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源泉，应不为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俄罗斯中心研究员)